

训诂简论

北京出版社

训 诂 简 论

陆宗达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625 印张 87,000 字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198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书号: 9071·50

定价: 0.41 元

前 言

训诂学是我国的一门古老的科学。它从语义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献，是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首先必须运用的一门基础科学。它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今天还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过去的训诂学有它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今天，在近代语言科学以及其他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应当使训诂学有更深、更广的发展和运用。但是，训诂学这门科学常被看成一门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学问，影响了它的普及。因此，有必要对它的范围、内容、方法以及如何运用等问题，作一些简单扼要而又通俗的论述，并对前人在训诂上的成就，作一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它和运用它。

作 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什么是训诂	1
二、训诂的内容	15
甲、保存在注释书和训诂专书中的训诂内容	15
(一) 解释词义	15
(二) 分析句读	22
(三) 阐述语法	38
(四) 说明修辞手段	53
(五) 阐明表达方法	59
(六) 串讲大意	70
(七) 分析篇章结构	77
乙、保存在文献正文中的训诂内容	83
(一) 以训诂形式出现的正文	84
(二) 以正文形式出现的训诂	91
三、训诂的方法	97
(一) 以形说义	98
(二) 因声求义	104
(三) 核证文献语言	117
(四) 考察古代社会	124

四、训诂的运用	141
(一) 运用于古代文献的注释工作	143
(二) 通过训诂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及其科学文化	152
(三) 运用于工具书的编纂	157
(四) 运用于指导阅读和语文教学	164
(五) 训诂在汉语科学研究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68
后 记	171

一、什么是训诂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仅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三千四百余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非常灿烂辉煌的文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世界人类的进步也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批判地继承古代遗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国古代保留至今的遗产，除了一部分实物以外，绝大部分是运用当时的语言——古代汉语，使用当时的文字符号记载下来的。我们知道，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文字，也要随着书写工具的改进、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语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样，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后代人去读前人记载的文献典籍，就会遇到语言文字的障碍。比如，汉代人去读先秦或更早的典籍，已略有困难；而到了唐代，一般人对两汉、先秦的典籍，就更不容易懂了。所以，在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时，就

需要首先扫清文字障碍、减少语言隔阂。只有突破了语言文字这一关，才能正确理解古代文献的内容。因此，早在汉代，就开始有了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叫作训诂。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后来所说的文献语言学。

“训诂”这两个字连用，始于汉代的《毛诗诂训传》^①。“诂训”就是“训诂”，一般人对此都比较生疏。应当怎样理解它的涵义呢？唐代的训诂学家孔颖达在《诗经·周南·关雎》的疏中对“训”和“诂”分别作了解释。他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他还综合起来给“训诂”下了定义：“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在这两段话里，孔颖达从当时的训诂工作出发，阐明了“诂”和“训”的不同涵义，指出了“训诂”的意义和范围。孔颖达的意思是说，诂和训，是解释语言的两个不同的法则：（一）“诂”是解释

① 《毛诗诂训传》，是毛亨为《诗经》所作的传注，简称《毛传》。毛亨又称大毛公，见后汉郑玄《诗谱序》。有人说他是汉初人，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代的六国人。“传”是一种发明经典大义的体例。相传古代六经都有传。如《尚书》在孔丘以前就有传，孔丘为《周礼》作过传，孔丘弟子子夏为《礼记·丧服》作过《丧服传》，《春秋》有左丘明的《左传》、公羊高的《公羊传》、谷梁赤的《谷梁传》。这些传都是用来发挥经义的，有叙事、通论、序录、略例等体例。毛亨注释《诗经》虽有叙事，但却以解释语言为主，所以叫《毛诗诂训传》。

“异言”的。所谓“异言”，就是同一事物因时代不同或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比如，《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这是因时而产生的异言，也就是古语。又如《诗经释文》：“楚人名火曰燥，齐人曰毁，吴人曰焔(huǐ音毁)。”这是因地而产生的异言，也就是方言。我国古代的学者和训诂学家，不但对前代的古语十分重视，对各地的方言也早有研究。对因时而异的古语，用当时的今语去解释，对因地而异的方言，用当时的标准语（雅言）去解释，这就是“诂”。（二）“训”是“道形貌”的。所谓“道形貌”，就是对文献语言的具体含义，进行形象的描绘、说明。这就不只是以词来解释词，而且要用较多的文字来达到疏通文意的目的。它包括对词的具体含义和色彩的说明、对句子结构的分析、对修辞手法的阐述以及对古人思想观点和情感心理的发掘，内容十分丰富。它所解释的语言单位也不只是词，还包括句、段、篇。所以《尔雅·释训》以“训”命名，其中所训的有“是刈是穫”、“张仲孝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等句；又其中引《诗经·淇奥》几乎是全篇。这种对句、段、篇具体含义的解释，就是“训”。对于语言的内容来说，无非是包含社会所公认的概括意义和运用者所取的具体含义这两个方面；对于语言的单位来说，

无非是词、句、段、篇。所以孔颖达说“解释之义尽归于此”。

近代学者黄侃先生对“诂”、“训”二字的解释，反映了训诂学进一步发展后所具有的新的含义。他说，“诂”就是“故”，“本来”的意思；“训”就是“顺”，“引申”的意思。这个解释，过去也有人讲过。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诂，故言也。”汉代人也常把“诂训”二字写作“故训”。魏代的张揖在《广雅》里也说过：“训，顺也。”这些，都是采用声训的方法来解释“诂”、“训”的语源，从而明其定义。“诂”的语源是否是“故”，“训”的语源是否是“顺”，我们且不在这里研究。但应该看到，黄侃先生对“诂训”的解释，说明他已有了词义的系统的观点。在解释词义的时候，首先要推求它的本义，即可以推溯的最原始或最核心的意义，然后沿着词义发展的线索，找出它不同的引申义。这样才能完成对一个多义词词义系统的解释。比如《诗经·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毛传》解释说：“京，大也。”这一段话是说挚国任姓的第二个女儿从殷商来嫁给周国王季（文王的父亲）的事情。“嫔”当“妇”讲，“嫔于京”，本来是说挚国任姓第二个女儿到周国的首都来作媳妇。但毛亨不把“京”解释作“京师”，而解释作“大”。他的意思是说，“京师”的意思，是从

“大”这个本义里引申出来的。由此可见，推求本义和说明引申义这个工作，早在训诂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在进行。而黄侃先生的解释，把它理论化了。从孔颖达的解释到黄侃先生的解释，说明到了近代，训诂学的研究范围已比较固定，方向也日益明确。它偏重在语义的研究，研究的语言单位更偏重于词。而且，这种研究，已经伴随着对词汇理论的探讨进行了。

事实上，从汉代把《毛诗诂训传》的“诂训”变为“训诂”以后，“训诂”二字已经成为语义学的专有名称，不需要也不能够分开解释了。我们介绍以上两种解释，不过是因为它们都从当时训诂学的情况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训诂”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内容和范围，有助于我们了解“训诂”名称的由来罢了。

训诂学是在发展中经过不同的阶段逐步建立起来的。

早在两汉时代，训诂这门学问就已很发达。六经、历史、诸子和文学作品都有注释^①。但最初的训诂，严格地说还不成为一个学科。它只是一种附属于古代典籍而随文释义的专门工作。当时的训诂资料，

^① 汉人郑玄的《三礼注》等，是六经的注释。应劭的《汉书音义》、服虔的《汉书音训》，是历史的注释。赵岐的《孟子章句》、许慎的《淮南子注》等，是诸子的注释。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文学作品的注释。

存在于古代文献的注释中，没有独立出来。它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完整地解经，内容包括注音、辨字、校勘、释义。释义又包括释词、释句、释段、释篇和发挥阐述思想观点、点明修辞手法等。因为它无所不包，所以黄侃先生说它是“用语言来解释语言的学问”，这个概括是很有道理的。那时的训诂方式主要是注释书（包括传、注、疏、笺等）。毛亨所作的系统解释《诗经》的《毛诗诂训传》，就是这种训诂最典型的样式。

此后，在这种随文释义的训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另一种训诂的方式。一些训诂大师们从实际的语言材料，也就是从注释书中，把被解释的语言单位抽取出来按照一定的原则加以编纂，形成了类似后代字（辞）典的训诂专书。这种专书不仅综合了训诂的资料，为阅读文献提供了可供查检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使训诂的材料在一定的法则下系统化，有利于在这些材料的相互联系和比较中归纳体例和理论，因而为训诂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打下了基础。这种训诂专书，影响最大的是汉武帝时就广为流传的《尔雅》^①和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

① 《尔雅》始见于汉武帝时。《汉旧仪》记载：“武帝初置博士，……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者为之。”《汉书·儒林传》称：“武帝诏令：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尔雅》本有二十篇，“叙篇”已亡，存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十九篇。

《尔雅》曾被称为“训诂学的鼻祖”，其实它不过是汉儒采取传注所作的训诂札记。它将古代注释（以《毛诗诂训传》为主）中曾经有过同样训释的词（也有一些句子）归纳到一起，再依它们意义的类别加以分编，是一部我国最早的训诂资料集。

《说文解字》是一部文献语言学的专著。一般人认为它是文字之书，但在开始时，文字和训诂是很难分开的。《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被称作“五经无双许叔重”。许冲在《上说文解字书》中曾说：“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为了对词义作出准确的解释，《说文》中引六艺群书四十余种，博问通人引诸家说解三十九种。因此，许慎成为当时公认的古文派训诂大师。《说文》根据“部首”将文字的形体分为五百四十部，用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法则来解释字形，又用以形说义的方法来解释字的本义，用“读若”和形声声旁来说明字音。这样，许慎实际上归纳出了把字的形、音、义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则，总结出了训诂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供的有关形、音、义的多方面的资料，为训诂提供了宝贵的依据。许慎较为明

确的文字观点和同时显露出的一部分语言观点，又为训诂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所以，说《说文解字》也是一部训诂专书，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训诂就是以注释书和训诂专书（工具书）这两种形式存在着，直到清代它才有了重要的发展。

清代研究训诂的学者有两个派别：一派是以惠栋、江声为代表的“钩沉”之学^①。这一学派以辨识古训、疏明古义为主，目的是运用语言文字学来阐明古书上没有弄明确的理论问题和具体问题，使学者能进一步理解前代的训诂。另一派是以戴震为代表的“创新”之学。这一学派以纠正旧注、创建新说为主，目的是批判旧注、发明新义，从而提出训诂的新理论，使训诂学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提高。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等人都属于后一派。这两派训诂学家，特别是“创新”学派的训诂学家，对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一方面研究汉代训诂家对古书的注释，搜集古训，而且从毛亨的《诗经诂训传》及其他注释书中归纳出训诂法则和训诂条例；另一方面，他们又研究《尔雅》、《说文解字》以及张揖

^① “钩沉”出于《易经·系辞》“钩沉稽远”，意思是使已经消失沉没了的东西重新显示出来。

的《广雅》等训诂专书，作了“疏证”，提炼出训诂学的理论，使训诂专书的数量大大增多，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在理论上首先建立了汉字形、音、义的完整体系，而且总结出“因音明义”、“以义证音”^①的规律，找到了通过文字研究通晓古代语言的途径。在语言文字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后，他们又将这些理论运用到训诂实践中去，更深入地研讨古训和旧注，重新分析古代文献上的语言，从而解决了更多的疑难，订正了汉唐以来注疏的遗漏和谬误。因此，清代学者三百年努力的成果，可以说是集中地发展了训诂学科。此后，近代学者在清代研究训诂的基础上，使训诂的方法更加科学化，提出了不少训诂理论，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种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文献语言学由附属于经典的随文解义，发展成为有自己的理论和专著的、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和方向的独立的科学。于是，传统的“小学”（古代专门研究语言文字学的一种学问）分成了三个互相有分工又有联系的门类：文字、音韵、训诂。这三个门类的总合，就是我国初具规模的传统语言学。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训诂”时，往往有两个不同

^① 戴震《转语序》说：“疑于义者，以声考之；疑于音者，以义正之。”

的涵义：一个是包含在古代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文献语言学的总称。它的研究范围还不甚明确：在内部，包括后来的文字、语言、词汇、语法、修辞等，彼此并无分工；在外部，与文献、校勘等学也未能划清界限。另一个则是与文字学、音韵学互相并列的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独立的门类。

那么，文字、音韵、训诂这三个门类如何分工？他们各自研究的范围是什么？彼此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文字学：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超越了口头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起到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①的作用。后代要研究前代的语言，必须通过文字。文字以它的形体，记录了音(形式)、义(内容)结合的词。而汉字有着区别于拼音文字的自身的特点，它是音节符号。古汉语大部分是单音节词，因此是一字一词。一般说来，原始的汉字是根据词义来确定字形的，所以一般人称它为“表意文字”(关于这一点还有不同的意见，这里不准备讨论)。传统语言学的文字之学，着重在识别汉字的字形，从字形

① 见许慎《说文解字叙》。

出发来辨明音、义，研究汉字形体的发展，从而达到归纳汉字造字法则的目的。古代的所谓“六书”之学，就是文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音韵学：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从形、音、义这三要素看，形是属于记录符号的因素，对于语言来说，是外在的，而音、义才是语言本身的内在因素。要想通过文字来研究语言，如果摒弃了声音而专从字形出发，势必会将文字记录语言的最本质的形式抛弃，或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或将二者绝对割裂，以致产生望形生义的弊病，走向谬误。因此，语音问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事实上，古今语言的嬗变、方言俗语的转化、文字的通用和假借、语词的分化……都必须涉及语音问题。传统语言学中的音韵学，着重在研究不同时期汉语语音的体系和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语语音的变化。切韵、等韵、古韵之学，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训诂学（狭义的）：语言所含的思想内容是它的核心。传统的训诂学着重研究词语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词的意义系统和词语之间分化派生的关系、词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当语法学和修辞学还没有独立出来的时候，这两个门类的内容，也是包含在训诂学中的。

如果简要地说，文字的研究偏重于形，音韵的研究偏重于音，而训诂的研究则偏重于义。不过，这三个门类的研究虽有以上的分工和侧重，但实际上又不能分开，必须相互联系和贯通。一方面，我们对古代语言文字的一切研究，都是为了通晓古书的内容，了解古人的思想，使古代文献还其本来面貌，从而达到批判继承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训诂是我们研究的落脚点。另一方面，训诂学在解释语言的思想感情时，是不能脱离文字的基础和语音的线索的。所以，历代的训诂学家都是紧密地结合文字学、音韵学来阐述训诂。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训诂和文字、音韵的关系。例如：

《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弋言加之，与子宜之。”《毛诗诂训传》说：“宜，肴也。”《郑笺》：“所弋之鳧雁，我以为加豆之实，与君子共肴也。”“宜”，甲骨文作“𩚑”，金文作“𩚑”（聃敦），古铎(niē)作“𩚑”、作“𩚑”，《说文》作“𩚑”，古文重文“𩚑”。可以看出，“宜”字本象屋内俎上有肉的形状。所以《毛传》、《郑笺》都训“肴”。肴是煮熟可吃的肉（今天还有“肴肉”之说），引申啖食熟肉也叫肴（后转为“噍”，即“嚼”）。《说文·肉部》：“肴，啖也。”可知《毛传》、《郑笺》训肴，就是训啖。至于《说文·宀部》“宜”训“所安也”，则是根据《诗